



吉林市重庆路

□蒋薇

传播学之父施拉姆说,人类传播分为四个阶段: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作为“70后”,我们跨越了人类传播史上的分界线。我的童年生活在报社大楼——印刷传播的中心,而今天我们已进入电子传播、网络传播时代。在开启AI的智媒环境里回忆上世纪的媒介旧址,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吉林市重庆路79号,是吉林日报社旧址,也是江城日报社旧址,它承载着两份党报的创业历程,见证了印刷传播时代的辉煌,它还是我生命的起点。童年记忆能够成为媒介史研究的资源,真是非常幸运。请让我以见证人、亲历者的身份,讲讲吉林市重庆路79号的故事。

两报同址

我不曾在吉林日报社工作,父母也不是吉林日报社的记者或编辑,为什么我会熟悉吉林日报社旧址呢?因为这栋楼先后为吉林日报社和吉林市日报社(即江城日报社)所用。作为江城日报社的家属,我非常熟悉这栋楼。

我家自1958年起在这栋大楼工作、生活,与这栋楼关系密切。我父亲是原江城日报社总编辑蒋光宜,母亲是原江城日报社美术编辑闻人新。我父亲1958年从部队转业来到报社,正值《吉林市日报》(后来改名《松花江日报》《江城日报》)由四开小报改为对开大报,急需新闻干部。为解决我父母两地分居问题,社长高狄将我母亲从浙江金华市文化馆调来担任美术编辑。我母亲闻人新今年95岁,她仍清晰地记得搬进这栋大楼的情景。她于1958年4月15日到达吉林市,起初住在通天街96号的报社大院,一周后——1958年4月22日,搬进重庆路79号。吉林市日报社全盘沿用了原吉林日报社的办公楼和印刷厂。1958年4月27日,《吉林市日报》发出迁址公告。

重庆路79号本是吉林日报社的办公楼。1954年9月1日,吉林日报社迁往长春,离开了这栋楼。1955年,吉林市筹建新的市委机关报,市委副秘书长高狄担任报社总编。高狄后来曾任吉林省委书记、人民日报社社长。1956年11月1日,吉林市日报社成立。一周后——吉林日报社派出8对夫妇支援吉林市日报社,他们是:李初之(李克)夫妇、常辰生夫妇、徐文连和潘锡石夫妇、赵登举夫妇、徐善民夫妇、刘士椿夫妇等。这8对夫妇是吉林日报社的骨干,他们将心血倾注在吉林市日报社,两家党报的关系更加紧密了。

我父母和我哥哥在这栋楼里住了约10年。我出生在离这栋楼不远的站前卫生所,出生后56天就随妈妈来楼里上班。直到1988年上大学离开吉林市,我的生活一直没有离开重庆路79号。对于这栋楼,我熟悉它的每个角落。

原为旅馆

这栋楼原是日本人经营的高级旅馆——日清旅馆,始建于1932年。1935年溥仪来吉林市望祭长白山,熙洽组织的“吉林满洲旧臣迎宴团”就在这家旅馆门前跪迎。

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离火车站很近,步行10分钟路程。门外开阔,有一块类似小广场的空地,门前有电车道,大马路从火车站延伸过来,直达江边。公交站点就在门口,交通便利。大门正对十字路口,对角也是一栋白瓷砖的日式小楼,是铁路局公安处、铁路派出所,伪满时那个楼叫铁路警察署。

作为旅馆的这栋楼用料扎实,基础部分全部用鹅卵石砌成。楼共3层,每层面积800平方米。大楼朝向十字路口的立面采用圆角设计。楼

内设施很现代化,在地下室设有锅炉,能给整栋楼供暖,每个房间装有暖气。每一层楼都有盥洗室、卫生间、浴室。每间客房不大,但设计紧凑,有放行李的地方,有推拉门式壁橱。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壁橱,捉迷藏时躲进去,大家都找不到。

大楼正门是一对又厚又沉的大门,门的弹簧极好,推开后一松手,门就重重地回弹。进门后有一个宽敞的大厅,迎面是宽阔的楼梯,水磨石扶手,上到一楼半就分成左右两侧。这个水磨扶手是我童年的滑梯,最大胆的时候,我可以从二楼趴着滑下来。上到二楼,也有一个宽阔的大厅,通往三楼的楼梯在窗边不显眼的地方。

党报大楼

这栋楼成为吉林日报社办公楼以后,就被改造成党报大楼,增添了媒体功能。

我记得正对大门口的楼梯上去,挑空很高,墙上写着四个大字:“开门办报。”我小时候识字不多,这几个字特别好认,就记住了。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这是毛泽东在1948年对《晋绥日报》的编辑记者讲话时提出来的。当时还有一句话——编辑部叔叔阿姨常说,也是毛泽东的话,叫“政治家办报”。

“开门办报”这四个大字彻底改变大楼原有的旅馆身份,成为党报大楼的标志。虽然大楼还有旅馆痕迹,但是已经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作为党报工作场所的特征了。这里是党在地方的一个工作站、服务站。无论是吉林日报社还是江城日报社,都不仅仅是一家报社,更是为各级各类党的新闻机构提供服务和帮助的接待站。也正是这个原因,吉林日报社很多老记者的名字我都很熟悉,他们只要去吉林市采访,一落脚就先到江城日报社去。徐中天、关东镇、肖铮阿姨、冯集中、美术部的画家戈沙、摄影部的李明可等,他们都经常去江城日报社。

二楼南侧是摄影美术部,有一个很大的暗房。我母亲当时做美编,她跟我讲: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刘忠、刘恩泰,吉林日报社的严启凤伯伯讲四川话,出版部主任梁耀翔伯伯有广东口音……他们消息灵通,思想深刻,充满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感,常常为一封群众来信而打抱不平、艰苦调查,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我当时很小,但也深受感染,后来报考新闻系就是向往和他们做一样的事业。

报社三楼再往上,有个类似阁楼的地方,是报社电台。那里每天接收新华社电稿,用一种细长条的纸来接收,电稿打印在很长很长的一厘米宽的线条上,文字是蓝色的。被采用的电稿就截成一段一段地贴在稿纸上,送去排版。剩下的纸条就被我们拿去做手工,能盘成碗、盘等各种东西。

记忆碎片

现在这栋大楼已经没有了。但它存在于记忆中,永不磨灭。闭上眼睛,我会觉得自己变回孩子,重新走进重庆路79号。

一楼左手第一个房间是收发室,墙上开了窗子,有宽阔的窗台。我长大以后才明白,那是旅馆办理入住手续的地方。大理石窗台很宽,大人们常把小孩子放在上面。记得1977年的冬天,小学一年级的我坐在窗台上,听见叔叔阿姨说我:“赶上好时候了!”我好奇地问:“什么是好时候?”他们说:“恢复高考了。”

一楼南侧是托儿所和纸库。我还在襁褓中就来到这里,直到6岁上小学。房间门是卡扣式,在本该放锁的地方放一个转动的凸起圆轴,一推一拉就可开关。屋里有整面墙的大壁橱,里面分上下。后来我给孩子讲日本绘本时,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场景。托儿所旁边是纸库,我看见爸爸妈妈和叔叔阿姨们挥汗如雨地推着巨大的圆纸筒过来,那是用于轮转印刷机的纸。一楼的西侧是食堂和报刊库。食堂是旅馆原有的,还有很大的厨房。

据说在20世纪50年代,周末常在食堂办舞会。报刊库是用仓库改的,空间很大,里面放着订阅的全国各地报刊。我小时候随妈妈进去过,报刊架“顶天立地”,收藏量非常大。

记得二楼南侧是一个长长的阳台,连接很多房间。房间幽静,阳光充沛,不临街,每间都有一扇门通向阳台。这座楼成为吉林日报社办公楼以后,二楼南侧就成为编辑部。这条长阳台把编辑部变成半开放式,记者编辑商量稿件时不用经过走廊,通过阳台就可以见面。这有点像今天的采编平台,沟通方便。这样的布局,我们小孩子特别喜欢,来回跑,通道很多。

三楼北侧是宿舍,我父母和哥哥曾住在这里。一起住宿舍的还有很多家庭,如从吉林日报社来支援建设的徐文连、潘锡石一家,他们的儿子徐海和我哥哥蒋泓都出生在这栋楼里,生日只差一个月,他们一起在楼里长大。后来,他们都成为新闻工作者:徐海是吉林日报社记者,徐海的姐姐徐海燕和我哥哥蒋泓在江城日报社当记者。

三楼南侧是总编辑、副总编辑等人的办公室,其中一些房间有独立阳台,我猜过去是高级客房。我父亲当时担任副总编辑,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南侧最西边,没有阳台。我太淘气了,小学一年级暑假,我从二楼阳台旁边的墙上铁梯往上爬,快爬到三楼,刚好这里就是爸爸的办公室。他走到窗边,无意中看到我。我悬在空中,一时愣住。记得爸爸没有生气,只是向我微笑。我默默地往下退,安全地回到二楼阳台。我忐忑地等待回家后的批评,但出乎意料,爸爸一直没有提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写重庆路79号,我几乎忘记这件事情。但是,爱是不能忘记的。

重庆路79号旁边是小广场和江城剧场,那也是吉林市的一个文化中心。记不得有多少次,我和爸爸妈妈在食堂吃过晚饭后没有回家,而是去江城剧场观影看戏。我父亲爱好音乐、诗歌,母亲从事美术工作,他们与导演、舞美设计师等文艺界人士交往颇多,常带我出入江城剧场、红旗剧场、话剧团。了解剧场,对我后来在长春日报社担任文化记者帮助极大。采访明星时,我不需要通行证,因为我知道剧场的门和通道非常多,从内部通道就直达演员休息室,和化妆师等待上场的明星们聊天。

在这栋报社大楼里,聚集着说话南腔北调的知识分子。我爸爸有苏州口音,我妈妈是浙江金华人,上海刘姨(刘慧珍)说话速很快的上海普通话,总是值夜班的严启凤伯伯讲四川话,出版部主任梁耀翔伯伯有广东口音……他们消息灵通,思想深刻,充满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感,常常为一封群众来信而打抱不平、艰苦调查,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我当时很小,但也深受感染,后来报考新闻系就是向往和他们做一样的事业。

楼已不在,往事走远。而我与吉林日报社的关系如此之近。我的生命,是从那栋曾是吉林日报社旧址的大楼开始的。

(注:1979年初,江城日报社迁入松花江边新址,结束了20多年报社编辑部与印刷厂分隔两处的局面。吉林市针织厂紧邻报社印刷厂,于是这栋编辑部办公楼与印刷厂一起转给针织厂。编辑部大楼后来成为吉林市袜子厂。上世纪80年代末,这栋楼回归旅馆。再后来它被拆掉重建,现有建筑比原建筑高,但位置、占地与原来相同。)

翻箱倒柜,终于找到珍藏20多年的心爱之物——2003年2月1日(正月初一)的《吉林日报》。这是《吉林日报》历史上首次试出彩版,能亲手精心编辑这两块版,至今心里仍充满愉悦感。

当年1月31日(除夕)下午4点刚过,我接到第一编辑室副主任张福祥的电话:“经社领导最后拍板,出彩报的事儿今晚落实,要在大年初一给读者一个惊喜,给羊年添彩。先出个一、四通版,蹉蹉路子。”

福祥说:“夜班稿件夹和照片筐放桌上了,你今晚比以往再早点儿到单位,把配完版的稿子编一遍,争取干净点儿上版;摄影部记者有一组‘庆大年、迎新春’的照片,你多策划几个版式,供夜班领导选择。”

放下电话,我仍很兴奋,胡乱扒拉一口吃的,就急忙往单位跑。

编前会审过的文稿有11篇,基本都是手写稿,白班编后乱乎乎的,我认真修改一遍。其中有2篇因文面太乱,怕照排、校对人员看不清,我便换了页,加了几张稿纸(原页保留)。

18点,我开始策划版式。出5个样本,其中,有2个把报头挪到右下角了。

文字稿除编前会审过的之外,还有2篇夜班交稿。新华社电稿就发央视《新闻联播》的头条,并配照片。

激光照排室的小刘上班

后,我一会儿送一篇,一会儿送一篇,让他先敲字、发清样。

听到校对科屋里有动静,我急忙过去,与科长丁兆旭商量:照排发出清样后,立即校对。照排至少出3次清样,要把稿子处理成电稿那样。需要哪篇上版,我直接往上调,把精力放在版面布局和标题、照片说明上。丁科长同意。于是,大家一顿神忙。

21点,社委赵春江主持夜班工作,除夕夜大战的兵将全部到位,战斗正式开始!

首先是落实版样。一顿嘀咕,初步选中第3稿(后来又有数次调版)。

头题刊发中共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新华社通稿,配2张图片(一横一立)。这样布局应该更得体。

22点左右,摄影部记者付平打来电话说,他正在长春街头拍除夕夜群众放礼花的照片,想发一组。我告诉他,发一组有困难,你就挑最好的发一张吧,做成立片,我

马上折腾版,给弄出块地方。他照做了。

凌晨1点,第4次调版,形成了现在见到的样子:8篇文字稿、11幅照片、2幅画作;文稿尽量删短;图片想法做大;突出“年味儿”;注重色调搭配,增强视觉冲击力,想给读者脑子里“刻个印儿”。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老领导徐中天到老年记协处理事情,我们在一楼大厅相遇。当他得知我是除夕夜要闻版的责任编辑后,非常高兴,连说:“好哇!好哇!本报从创办到现在,快60年了。从黑白到彩报,是个巨大飞跃;出彩报,是报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小程可是报社的功臣呢!”

我说,这是上夜班赶巧儿排到这儿了,而且是试刊。背面的二、三版还是黑白呢。

徐老说,应该很快变成全彩版。既然开了头儿,估计实现新闻版全彩报就不会太远了。

徐老预言,果然很准。

你的色彩 我的心跳

□程德禄

我与《吉林日报》的故事

日报》去发表。”那时的我,像是找到了自己的爱好,便乐此不疲。每次画完,我都兴致勃勃地送到父亲面前。可是,最后也没见到我的蜡笔画在报纸上发表。长大了才知道,当初父亲的话只是对我的一种鼓励,他这样一个认真的人,始终恪守原则,不会为我而破例。

在我上小学时,每一篇作文,我都不会拿给父亲看,知道他的认真劲儿,就怕他给我挑出毛病。小学三年级时,我写了一篇作文《校园新貌》,语文老师班上向同学们讲评了我的这篇作文。在父亲下班后,我满心欢喜地把作文拿给父亲看,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字迹有些潦草”,然后就拿起笔,在我的作文上勾勾画画。趁他批改时,我赶紧跑出去和同学们玩耍。等到再看到我的《校园新貌》时,作业本上已布满了红色的星星点点和条条杠杠。

在我上高中时,有一段时间对篆刻很感兴趣,就在长春市古籍书店买了一些篆刻方面的书籍,有《封泥汇编》和《李白凤印谱》等,同时,买来刻刀和石料进行操练。父亲看到我对此兴趣浓厚,便为我介绍了一位老师。毛振家老师是一位篆刻学者,2008年,他编纂了一部篆刻工具书《正反篆刻字典》。可遗憾的是,我与毛老师从未谋面,不曾当面对他接受他的教诲。原因是,我正在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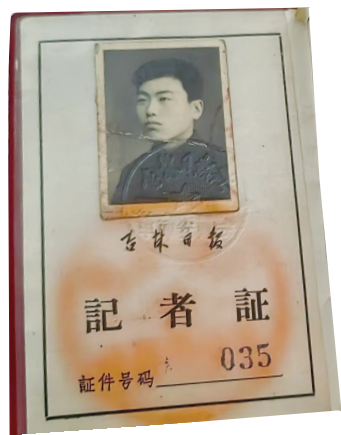
战高考。其间,都是通过父亲向毛老师传递我的篆刻习作,之后,再由父亲转述老师的指导内容。就是这样特殊的教授方式,让我有了飞速的进步。有一天,父亲给我带回来一张报纸,1984年9月23日《城市时报》试刊号(1991年更名为《城市晚报》)。在这张报纸上,刊登了我的两幅篆刻作品《情同手足》和《一衣带水》,也算实现了我在《吉林日报》所属媒体发表作品的心愿。父亲对我说,这两幅篆刻作品是经过毛老师认定后才送到报社编辑部的。如果毛老师认为作品不具备发表标准,父亲是不会请编辑审阅的。面对如此较真儿的父亲,我是心服口服!

2013年,父亲离世。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们几个子女看到了他年轻时的读书笔记,字迹工整,内容扎实。在读书时,父亲书写了3本《语文札记》,他对此只是珍藏研读,从未发表。他还把在《吉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剪下来,整理成册。面对这些发黄的纸张,子女们倍感亲切,怀念之情油然而生,仿佛看到了他在吉林日报社曾经忙碌的身影。还记得胜利公园旁,吉林日报社的旧址,那里有父亲朝气蓬勃的青春和兢兢业业的过往,还有他对新闻事业的执着,也有他对待事业一丝不苟的精神。

我的父亲

「赵老细」

□赵大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父亲在吉林日报社记者部工作。作为一名记者,他对自己的稿件要求十分严格。定稿前,字斟句酌,几乎达到了苛刻的程度。他在做编辑时,对来稿的修改同样细致入微。基于这样的工作习惯,同事们送他一个绰号“赵老细”。

1973年,7岁的我用蜡笔画了一幅小画,画的内容是:几位工人叔叔坐在装满货物的“大解放”车厢上。在母亲单位,我经常能看到有“大解放”卡车装卸货物——当时,全省的烟酒糖茶和肉蛋海产都是统一调拨的。先是从铁路运输线上把外地食品用卡车运送到省食品公司的一排排仓库,进行清点储存,再经过调配,由仓库分发到省内的每个国营商场。因为熟悉这样的场景,我就经常画一画这里的卡车和装卸工人。

当父亲看到我的画,便对我说,以后就学学美术吧。由此,我对蜡笔画产生了兴趣。过了一段时间,爸爸说:“好好画,我给你拿到《吉林

